

阳明学的文化意义

——吴震教授在“第五届阳明学与浙江文化学术论坛”上的精彩观点



吴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浙江省社科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国际儒联理事暨学术委员会会员等。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宋明理学、东亚儒学等。主要著作有《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传习录》《朱子思想再读》《阳明后学研究》《东亚儒学问题新探》《阳明学再读》等。

早在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便提到了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在不同场合引用王阳明的学说和主张。从文化角度看阳明学的文化意义,这是我们今天重新了解阳明学的一个重要维度,因为阳明学既是一种哲学思想,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传统。阳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阳明学的兴起与发展与当时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传承有着密切关联。从理论系统看,阳明学有着浓厚的文化意识、文化担当和文化精神。以下从三个方面略谈阳明学的文化意义。

阳明学的文化意识

“文化”一词,含义丰富而复杂。在中文中,文化一词源自《周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这里的“文”特指“人文”,与“天文”相对而言。文化就是指人类存在及其活动的方式,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思想、宗教、道德、艺术等各方面,因而文化往往表现出地域民族、时代社会、行为方式乃至价值观念的特性。孔子开创的儒学是一套文化体系,内含丰富的人文精神和重要的价值观念。

发轫于16世纪的阳明学,充分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学思想,在继承创新中国心学传统的基础上,王阳明得以形成自己的心学思想。这表明阳明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也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才会凝聚出阳明学的思想学说。也就是说,王阳明对心学问题的思考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文化主要包含孔孟开创的儒家思想文化。从阳明学的理论出发,就会发现心学不仅是一种哲学,更是一种文化,故有必要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阳明学的思想意义。

阳明学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特别

是孟子的心学传统,同时对于唐宋已深入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佛教道教的思想智慧也有充分汲取,对中国化的佛教以及中国本土的道教不是一味排斥,而是从文化接受的态度出发,对其思想作一番创造性的转化,使之成为建构阳明心学的有益营养。当然在文化传承等方面,阳明学的文化意识仍然是以儒学为主,从总体看,阳明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理论创新。这种创新之所以可能,根源就在于阳明学有着基本的儒家文化意识。

也正因为,阳明学是一种儒家文化的思想形态,而不是儒释道三教的混合形态,儒家文化构成了阳明学的思想主体,同时这一主体性思想又有多元性的表现。王阳明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叫作“厅堂三间”之喻,在三间厅堂当中,儒学占据正堂,佛道两教分居左右两间厅堂,三家共同构成一个屋檐,但正堂的地位仍然属于儒家。这就可以看出,儒家作为主体,可以包容佛道两家。这正是儒家文化多元一体的生动表现。

如果单从哲学的立场出发,由于预设不同,儒释道三家就不免发生冲撞,但从文化的角度看,由于佛道两家根据自身与人为善的思想学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人文化成”的意义,而阳明学无疑将“人文化成”当作自身的核心关怀、最高目标。故而阳明学对佛道两教的容纳吸收正反映出阳明学的一种开放精神,这一精神在晚明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现,也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多元一体的发展。

阳明学的文化担当

阳明学的文化意识具体展现为“担当精神”。这里所说的“担当”,具体指基于文化意识的社会担当。在历史上,儒学向来被认为是一种“经世致用”之学,经世致用意味着儒学从来不是脱离社会的玄思妙想,而是着眼社会现实的实践之学。用阳明学的术语来讲,实践之学表现为“事上磨练”。这里的“事”在广义上就是人的活动及其社会生活,其中也包含实际的个人心态以及人心意识所投向的“物”。

按照阳明学的“心即理”“物即事”的一套理论,一方面,人的身心离不开外在事物;另一方面,外事道理又必然投射在人的心性活动当中。也正因为,人的道德行为及身心实践必然在“事事物物”上得以落实。在阳明学看来,脱离人心活动而向外物寻求物理的行为,不免有舍本逐末的嫌疑。这种心理学理论看似过于强调心灵意识的主体性,而忽略了客观道理对人的正面作用,比如,读书明理既可增进知识,同时也可端正心态。然而在阳明学看来,道理的存在须通过人心的活动才能呈现其意义,知识的增长也唯有通过正确的身心状态才能展现其价值。事实上,理论或知识虽然客观存在,如同外在世界是

一种实在一样,但如果脱离了人的活动,那么外在世界将变得毫无意义和价值可言。

重要的是,人的活动总是与人心状态有关,而人心往往有双重性,既内含道德意识,又指一般的认知意识,这些意识活动对人心走向具有决定性作用。若就人心本质而言,人心受良心的本质规定,良心表现为善良的意识、意向或意志。阳明学的核心概念良知一般被解释为良心。由于良知是人之之为人的本质,故良知必然是大家拥有的普遍存在,这种普遍性的良知就可以成为社会伦理的规范。

不仅如此,根据心理学理论,良知更是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共同体正常运作的根源所在。尽管在思想史上,良知主要是指个人性的善良意志或道德意识,然而经过阳明学的理论推衍,良知不仅是个人性的道德意识,而且是一种“同是非”“公好恶”的社会性道德意识,因此良知象征着伦理秩序、社会秩序。近代社会从西方引进的“社会公德”论,其实在阳明学当中已有关注,尽管说法各有不同,然在实质上都强调社会的有序运作有赖于社会良知的力量,而这种社会性良知得以确立的基础又在于所有社会成员个人道德的增长。

毫无疑问,阳明学以确立个人性道德为基础,目标则在于重建社会的道德秩序,从而使社会文明的发展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承担起建设社会良俗秩序的责任,而且这种担当是根源于人心良知的义务。

阳明学的文化精神

大家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存在一种精神性传统,叫作“道统”,即圣人之道传统。这一传统由来甚久,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孔孟直至尧舜。但是从尧舜到孔孟长达数千年,这一传统何以得到绵延不断的传承?按理学家的道统论,儒家道统主要依赖“心传”(朱熹语)。这里的“心”不是指具体的人心,而是指一种绵延不绝的精神性存在。王阳明说过“圣人之学,心学也”,断定“心学”是贯穿儒学历史的命脉,故儒家道统也唯有依靠心学得以传承。这是阳明学的道统观,体现的主要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传统。

结合阳明学的良知理论来看,良知理性的个人性发展最终必然指向关乎人与社会的文化建构,因为良知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体现。文化精神是任何一个社会所必需的,而文化精神不能是空泛的,依阳明学的看法,一个社会的文化建构有赖于人的良知精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文化精神具体表现为每个人的良知精神。反过来说,良知精神又体现为社会的文明发展。

从理论到现实,从知识到实践,从人心到社会,存在一个互为转化的过程。在

此过程中有一个关键性因素不可忽略,就是社会每一个成员在内心中都必然存在道德理性的良知,由良知理性才能成功转化个人的道德,而个人道德的改善才能成功转化整个社会的道德。因此良知理论虽重在道德主体的个人转化,但更为重要的显然是如何转化社会的文明状态以及推进社会的文化建构。

自宋代新儒学开创了一套被称为“道学”的思想理论以来,道学家就有一种自觉的社会担当意识,叫作“以斯道觉斯民”(程颐),就是“以道觉民”的意思。贯穿整个宋明儒学思想运动的核心关怀,可用“以道觉民”一语来概括。在阳明学的时代,“道”的观念发生了内在化的转变,被内化为良知,而良知就如同天理一般的普遍存在。基于这一理论设定,阳明心学家普遍认为良知就是社会公道的象征。

根据《明史》记载,王阳明开创心学之后,出现了“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的思想现象。那么,阳明学何以在晚明一百多年的历史时段内,发生了如此深远的思想影响?究其原因,这与阳明心学推动良知理论世俗化、平民化的社会转化有着密切关联。在阳明学看来,良知不仅在理论上构成“乾坤万有”的根基,而且在现实中发生于“日用常行”的过程中,因为良知必然在日常生活中体现自身。这一良知学说以通俗化的语言方式,得以在士人及庶民阶层广泛流行。因为一个个人不能逃乎天地之间,更不能抽身于伦理社会之外。作为社会的具体存在,人的良知成为推动社会秩序重建的动力。所以对阳明心学而言,“以道觉民”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广大民众中推动良知实践。

正是基于良知即人之本心同时又是社会存在这一信念,王阳明强调良知具有“当下具足”而又“万古一日”的普遍性特征。由此,每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在日常生活中落实良知的实践。阳明学在晚明社会之所以有迅速扩展,根本原因在于阳明学良知理论不仅是一种哲学理论系统,更是一种“思想文化”系统,其中贯穿着以传承儒学命脉、勇于社会担当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文化精神。可以说,传承文化的使命感在王阳明开创的心学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理解阳明学何以会表现出“文化意义”。

总之,从文化的视域看,阳明学显然是儒家思想文化的一种传统形态。文化传统有其自身的生命力,现代中国文化的建构需要传统文化的加持,传统与现代之间不应是断裂的而应是连续的。因此儒家文化、阳明文化在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仍有着重要的意义。面向传统、立足现代、接续文化,以使传统文化得以创造性转化,这应当是当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课题。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浙江工商大学东西文明互鉴研究院特聘教授】

邓伟志:1938年生,安徽萧县人,研究员、编审,上海大学终身教授,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委。1960年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先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



《邓伟志全集》(25卷本)出版后,很多人问:“这一千万字是怎样写出来的?”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有65年,发表了近千万字的文章不算多。扣除“不宜动笔”的年代,能写出一千万字也不能算少。写,是奉实践之命、书本之命而行的。那时间呢?

说起写作的时间,是同我这个人不会生活有关。我是用“三少”换来了一个“多”,时间多。少一点拉扯。我是用别人串门的时间来写作的。有人说,“跑部”就不能前进,不串门不会成“亲信”,不会被重用。我怕成亲信。不过,我怕成亲信的动机是消极的,主要是担心随着重用而来的是被利用。利用来干好事,是荣幸;利用来干不该干的事,就难以自拔。我出于观察社会的需要,与不同立场的人切磋,与不同阶层的人琢磨,但都不是亲密无间,而是“亲密无间”。“亲密无间”有一个缺点:说话没人听。不过,这里有个价值考量:是怕“说话没人听”呢,还是怕“文章没人看”?我更怕后者,不计较“说话没人听”。“亲密无间”还有一个更大的缺点:欠下的人情太多,内疚,深深地内疚。但我坚持“秀才人情纸半张”,对恩人、对引路人用“纸半张”来表达,送“纸半张”比送2斤酒要雅。我对很多老领导,在他们风光时我不吹捧,在他们逝世后再忙也要为他们写挽联、写纪念文章。我大约为20多位老首长写过纪念文章。卫生员、理发员、驾驶员、炊事员、饲养员、电话接线员、机要员、警卫员等“八大员”对我多有帮助,有或大或小的恩情,在他们健在时或辞世后我都写赞扬他们的文章。

少一点扯皮。劳而无怨,我是用别人以牙还牙的时间来写作的。写文章有个准则:有的放矢。“失”一放,就难免引发“的”出来说“不”。有人一听“不”字就跳,甚至是睚眦必报。我不是。我认为与其花工夫扯皮,不如用这个宝贵时间从更广更深的理论层次上多写点东西。“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再说,有人说“不”,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关心、激励,有时比说“诺”更可贵。就是人家的“不”不对,那也会促使自己谨慎、谦虚、发奋。何况很多“不”也有合理成分。还有些“不”,是误会。要知道,误会会是戏剧性的翻版。没有误会就没有多彩的人生。“日久见人心”,不去纠缠,久了也能“见人心”。不用说,人间不扯皮是不大可能的。古人云:“仁者爱人所难忍,智者方能度世深。忍字高悬心自静,世间纷扰不沾身。刀光剑影皆能忍,方显英雄本色真。”忍一事,少一事,方能多一文。我的人生哲学是“与人无争,与世有争”,只愿为天下事多建言,永远铭记毛主席的教导,只为“指点江山”而“激扬文字”。

少一点娱乐。我是用别人打牌、看球、跳舞的时间来写作的。汉代是“足球”(当时称蹴鞠)极兴盛的时期。我的出生地距离汉高祖的出生地只有二三十公里。在我幼年时,村与村、乡与乡仍有赛足球的风俗。但是,母亲和外祖父怕我乐不思“书”,不让我出门,把我关起来看书、背书。因此,我身上的文体细胞极少。很多球星、明星无人不知,我不知。卡拉OK刚引进来时,我为知道了什么是卡拉OK,去过两次,后来就“OK”了,与之“拜拜”了。少娱乐并非没有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书中有乐,学到新知是乐,释疑解惑是化苦为乐。

此消彼长,没有那三方面的“消”就没有写作时间的“长”。熟悉我的人知道,我浑身上下没穿过名牌,饭桌上少不了大葱大蒜,没有什么美食,常常是十来分钟就吃一顿饭。家里的摆设也很简单,不必花时间整理。我这个从山坳里走出来的穷苦人,牢记《后汉书·马援传》里的“穷当益坚”,坚持认为,只有生活简单化,才能换得知识复杂化。再加上,1977年我在北京与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一墙之隔,常与华罗庚所长见面,向他讲起1958年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看到他讲运筹学的科普文章。在他教导下开始晓得一些农民套种、夹种的道理,最终就是用这60多年的时间炮制出了《全集》的这些已发表的文字。其实,除此以外,还有200万未曾发表过的文字没有收进去。

我今年87岁了,仍坚持“晨起鸟啼前,夜卧人静后”。尽管“春蚕”已经变成爬不动的“老蚕”,只要没死,就要为科学、为社会继续贡献几根细丝……

新书荐评

浙江工业大学方英教授的专著《文学空间批评》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2017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也是一部系统讨论文学空间批评的著作。

该书结合哲学、地理学、社会学、诗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空间理论,在梳理空间意义发展脉络和“空间转向”的基础上,开展多向度的跨学科文学研究,由此提出“文学空间批评”这一研究领域,并重点讨论了该领域的几个话题:文学空间批评的特点与方法,空间与权力、空间与存在、空间与意识形态、空间与性别、空间与伦理、文学的空间模式等,初步完成了该研究的理论建构。该书具有前沿性和创新性,为文学研究引入了新理论,探索了新视角和新路径,得出不少新发现,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

该书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特色。首先,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为理论指导,坚持空间辩证法和文学批评的历史语境。其次,坚持以亨利·列斐伏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空间观,认为空间是生产性、社会性、建构性、多元性、流动性的。再者,在理论建构和文本批评中,整合并运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路易·阿尔都塞、雷蒙·威廉斯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



【作者为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衢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挂职)】

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动能

——村志编撰对乡村发展的借鉴作用

吕克军

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做好村志编纂工作,一方面离不开深入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离不开群众的自觉参与。习近平同志在白沙村调研时就指出,“农民搜集资料,专家当主编,‘土洋’一结合,村志成书了”。新时代推动村志编纂工作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采取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方式,这也是村志编纂工作的经验总结和科学方法论。

村志不仅是静态的志书文本,还应有丰富的传播方式。近年来,浙江积极推进各级方志馆特别是村志馆的建设,在建设“活态”概念,形成基于中华文化自觉、原住民广泛参与、专业部门指导、反映乡村生活方式、可延续的村志馆建设模式。比如,白沙村村志馆以“中国村志第一村”为符号,集中展示了本村历史和村志文化的内容。又如,杭州萧山区衙前镇凤凰村结合衙前农民运动与乡村发展成就,编纂出版《凤凰村志》,并把村志内容搬上手机端,成为“全国首部掌上村志”。

发挥村志的文化动能

修志是为了用志。习近平同志考察白沙村时深刻阐释了村志的功能。他指出:“几千年来,国有史,家有谱。不过,家谱毕竟是一家一族的文化,而村志则不同,它能反映全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面貌,又有与全体村民休戚相关的人和事的记载,最起码的存史作用是很大的啊!”

在笔者看来,村志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存史方面,村志通过对一地历史客观史料的系统纂述,使传统史事、生产方式、生活形态、先贤事迹、文化典籍等得以保存;资政方面,村志对地方治理具有现实作用;教化方面,村志以潜移默化方式对地方文化和民众行为方式进行塑形。如今,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推进,凝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乡村发展经验的村志,在其中发挥了赋能乡村经济、助推乡村善治、激活乡村文化的独特作用。

赋能乡村经济。习近平同志对白沙村提出“把村里搬迁的大变化写进新村志里去”。这既是对《白沙村志》编写内容的指导,也是对白沙村整体搬迁工作的肯定,同时也为白沙村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据《白沙村志》记载,白沙村原处仙霞山中,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为实现村民稳定脱贫,2002年该村整体搬迁到现址。当地党委、政府选择符合当地特色、市场环境、自然地理条件、农户主观意愿以及市场需求的产业,作为扶贫主导产业。村民通过走出去、引进来,兴办各类企业,形成了稳定的收入结构。白沙村作为一个移民安置村,因修志而闻名全国,也因修志凝聚民心,促进乡村经济良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村志不仅是保存乡村历史成就和发展经验的载体,也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了发展动能。

助推乡村善治。志书的功用之一便是风评人物、教化百姓。村志保存着一个村

庄的“根”与“魂”,记述了一个村庄的文化传承与治理经验,内在蕴含着以文化治理促进乡村良治的功能。村志通过教化功用,在干部群众中树立以勤廉贡献为荣、贪腐落后为耻的风气,为乡村德治凝聚文化力量,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善治体系。比如,白沙村在乡村治理中,规范推进村务公开,每年公布村里财务收支;聘请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担任村务监督员,总结吟唱《村务员五字经》,对村务和村干部进行监督;每年春节期间进行一次全村大合影,群众戏言参加合影人数的多寡是村干部评价的“晴雨表”……《白沙村志》对这些都作了详细记载。

激活乡村文化。乡村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生命家园,有着深厚的底蕴。村志中既有对村落基址、祠堂民居的描绘,也有对民风习俗、乡情乡韵的记录,还有对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的叙述,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志的编纂与传承,促进了乡村文化的振兴。比如,白沙村深入挖掘村志文化的内涵价值,切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村规民约等融入村民生活;以建设“乡村志第一村”为抓手,高标准建设村志馆,全面展示村庄的历史与现状;深入推进社科项目实施,积极参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发起的中国名村志丛书编纂工作,《白沙村志》于2024年12月入选第八批中国名村志丛书名单。

【作者为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衢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挂职)】

社科论衡

村志是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文本,在乡村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和独特价值。1981年,衢州江山市凤林镇白沙村开始编纂《白沙村志》,历经10年完成并出版,成为中国首部公开出版的村志。2004年10月10日,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习近平到该村考察,认真翻阅《白沙村志》,并对编纂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村志一方面记录了乡村振兴的成果,另一方面其对传统经验的记述又能为乡村发展提供借鉴。

做好村志的编纂和传播

明代学者龚用卿说:“志,记也。记其事以为鉴,史之流也。天下之有志,犹国而有史。”地方志是中国历史的传统记述方式之一,与史书、家谱构成了系统的历史记述体系。村志,是地方志里的“最小单位”。村志虽小,“五脏俱全”,它全面记述了乡村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的发展情况,可谓是“乡村价值”全方位、多角度的承载者、展示者。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博物馆参观北京历史文化展览时强调,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

邓伟志